

#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1917—1977)

[美] 马克·斯洛宁著

浦立民 刘 峰译 毛信仁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rc Slonin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Writers and Problems  
1917—1977

---

本书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7 年版译出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1917—1977)

〔美〕马克·斯洛宁著  
浦立民 刘 峰译 毛信仁校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译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36,000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册

书号: 10188·406 定价: (六)1.40 元

内 部 发 行

## 前 言

本书的名称既决定了它的范围，也决定了它所涉及的内容。由于本书所研究的内容是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因此它不包括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其他民族语言的作品。本书主要介绍苏联作家，因而对那些流亡国外的作家概予从略，对他们的著作将另作专门评述。本书编写的方法和我以前编写《俄国文学史诗》和《从契诃夫到革命》的方法相同，本书可以说是以上两书的续编，虽然各卷都能独立成篇。我力图结合社会和政治背景来描写这些杰出的作家，并在探讨个别诗人和小说家时，交替地分析他们在极权主义国家中所不得不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要提供苏维埃文学的真实历史情况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们都这样认为，要评价当代人物是桩没有把握而艰巨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文学评论家评论故世的作家要比评论在世作家容易得多。但是，就苏联文学说来，我们更面临到种种特殊的困难。我们连对那些自然死亡或者死于非命的作家的有关材料都很缺乏。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尚未发表的作品可能被封存在秘密的档案中。我们对斯大林清洗和恐怖时期被镇压的受害者情况又没有精确的材料。而且苏联在以往六十年中所出版的传记和评论，大多是篡改和伪造历史，满纸谎言，蓄意捏造，歪曲事实和进行政治上的欺骗，使得现代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遇到了无数的险滩暗礁。在斯大林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党的文艺政策不断变化和曲解，使得官方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许多事实

都被删去，不少情况避而不谈——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文学适应共产主义观点的最新框框。

一个研究者，尽管充分施展其才干，也不容易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评价、秘而不宣或者赤裸裸的谎言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安全的道路。如果要了解真正的文学情况，他就得慢慢研读数量惊人的小说、诗歌、散文、论文、党的决议、官方评论文章——这决不是一桩有趣的工作，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耐心和特殊的鉴别力，从字里行间探求其隐藏的意义。我希望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能胜任愉快地对苏联文学作出比较精确的介绍，能够区分真正的成就和带宣传性的糟粕，能够估计国家和统治着文学的教条主义对苏联当代散文与诗歌的所施加的压力情况。我还希望能对过去年代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公正的判断——斯大林时代以后的文学复兴，新一代作家的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话的彻底破产，以及政府旨在遏制艺术家们趋向自由独立的不可逆转的运动所采取的种种曲折的政策。

我所提供的概况决不是详尽无遗或者确切无误的。我也完全知道我取这些而舍弃另一些作家，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我觉得，我所作的这些努力对于了解苏联的文化生活也许是有所帮助的。

马克·斯洛宁

萨拉·劳伦斯学院

布朗克斯维尔，纽约——日内瓦，瑞士

1964年 秋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I   |
| 第 一 章 变迁 .....                                         | 1   |
| 第 二 章 谢尔盖·叶赛宁：恍惚迷离的农民 .....                            | 9   |
| 第 三 章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革命诗人 .....                          | 17  |
| 第 四 章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                                   | 32  |
| 第 五 章 新经济政策与二十年代 .....                                 | 40  |
| 第 六 章 鲍里斯·皮里尼亚克：不合时宜的<br>象征派 .....                     | 59  |
| 第 七 章 伊萨克·巴别尔：浪漫主义小说家 .....                            | 67  |
| 第 八 章 符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精力旺盛<br>的西伯利亚人 .....                  | 74  |
| 第 九 章 叶甫盖尼·扎米亚金：好讽刺的持<br>不同政见者 .....                   | 81  |
| 第 十 章 米哈伊尔·左琴科：被定罪的幽默家 .....                           | 92  |
| 第 十 一 章 “谢拉皮翁兄弟”、“山隘”以及“真<br>正艺术协会” .....              | 100 |
| 第 十 二 章 米哈伊尔·普利什文：热爱大自然<br>的人 .....                    | 110 |
| 第 十 三 章 苏联浪漫主义作家：从格林、帕乌斯托夫斯基<br>和奥列夏，到吉洪诺夫和巴格里茨基 ..... | 117 |
| 第 十 四 章 康斯坦丁·费定：传统的小说家 .....                           | 137 |

|       |                                     |     |
|-------|-------------------------------------|-----|
| 第十五章  | 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写轶事的大师 .....              | 148 |
| 第十六章  | 从五年计划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160 |
| 第十七章  | 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学：从富曼诺夫<br>到奥斯特洛夫斯基 ..... | 173 |
| 第十八章  |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史诗的记述者 .....              | 194 |
| 第十九章  | 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心理小说家 .....               | 204 |
| 第二十章  | 伊里亚·爱伦堡：杰出的新闻记者 .....               | 219 |
| 第二十一章 |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另一个俄罗斯<br>的代言人 .....     | 230 |
| 第二十二章 | 稳定和专政时期 .....                       | 244 |
| 第二十三章 | 诗人的命运：曼德尔斯坦姆、阿赫玛托娃、<br>茨维塔耶娃 .....  | 257 |
| 第二十四章 | 历史小说 .....                          | 279 |
| 第二十五章 | 战前的岁月 .....                         | 289 |
| 第二十六章 | 战时文学 .....                          | 306 |
| 第二十七章 | 战争的后果：“日丹诺夫主义”年代 .....              | 319 |
| 第二十八章 | 解冻 .....                            | 336 |
| 第二十九章 | 不稳定的平衡 .....                        | 355 |
| 第三十章  | 身后恢复名誉：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br>扎鲍洛茨基 .....  | 370 |
| 第三十一章 |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伟大的挑战者 .....             | 382 |
| 第三十二章 | “萨米兹达特”：地下刊物 .....                  | 395 |
| 第三十三章 | 新手们 .....                           | 402 |
| 第三十四章 | 动荡与审判 .....                         | 414 |
| 第三十五章 | 第三代流亡者 .....                        | 429 |
| 译后记   | .....                               | 441 |

# 第一章

## 变迁

1917年沙皇帝国的崩溃，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从根本上瓦解了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化。从1917年11月7日<sup>①</sup>共产主义革命在彼得堡取得胜利并开始为全面统治俄国而斗争的那个时刻起，这种文化的社会和经济支柱，有利于这种文化的繁荣兴旺的那种特权的生活方式，以及使这种文化一直存在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开始分崩离析了。对于最初被胜利者视为潜在敌人的知识分子来说，十月革命这一事件简直是灾难性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的预言应验了，一夜之间整个知识界发现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残酷的动乱无情地抛弃了知识分子。“历史的铁扫帚把他们和其他残渣余孽一起扫掉，”托洛茨基说。他们所热爱和珍视的一切——温文尔雅、高尚情操、温和的人道主义、悔悟、矫饰，以及对美或对模糊的自由主义的崇拜——突然间都变得分文不值，而且在军事共产主义和内战的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显得极其格格不入。眼前所发生的事情都跟象征主义的先知们或满脑子神秘观念的激进分子那种堂皇的预言毫无相似之处：它只是意味着传染病、饥饿、监狱、流放——肉体和精神上的毁灭。俄国似乎处于极大的痛苦中，一大批诗人和小说家都觉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这块正在走向灭亡的土地举行葬礼。这种情绪出现在各种作品中，从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到爱伦堡的

---

① 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发生在旧历10月23日，或新历11月7日，所以俄国人称为十月革命，而世界其他国家则把它称为十一月革命。——原注

诗歌(《为俄罗斯祈祷》),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品,如舒米廖夫的《死者的太阳》(1923年)和蒲宁的《罪恶的岁月》或《吉皮乌斯的日记》。

十月革命后,文人的物质生活境况很快就变得不堪设想。只有少数的几个作家,如象征派诗人勃柳索夫和年长的小说家叶洛宁·雅辛斯基(1850—1930),革命一开始就参加了新政权。一大批文人(高尔基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仍然犹豫不决,而且多少持着批判的态度。绝大多数人不愿同“篡权者”、“罪恶的乌托邦分子”携手合作;他们专心致力于求生存、求免于饥寒和恐怖。在知识界中,有些人决心要“让自己消失在人民中”;他们到农村,象农民那样生活,直到内战结束,又以办事员、技术员、教员和图书馆员的身份出现。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就描绘了他们所作的这些努力。最后,有一大批人倒向白军,并最终定居国外——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政治流亡者。到了1922年,逃往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列耶夫,舒米廖夫,阿历克谢·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谢维里亚宁,明斯基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有一段时期,似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所有文学沙龙都重新在巴黎、柏林和布拉格开张了。吉皮乌斯<sup>①</sup>在二十年代初写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到国外去了。

由于种种原因而继续留在俄国的,包括象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些爱国人士,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陷于绝望的境地,还面临着巨大的思想意识、道德和艺术方面的问题。1914—1918年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已搅乱了文学生活的正常趋向,而共产主义又给了它几乎致命的一击。1918—1919年间,艺术处于灭绝的边缘。随

---

① 吉皮乌斯(1867—?)俄国颓废派女诗人。

着布尔什维克政变的第一声枪响，带来了同过去的彻底决裂。旧的报刊杂志不是停刊，便是遭到查禁，印刷机都被没收，成为国家的财产；出版社不是停业，便是凄凄惶惶，为求生存而费尽心机。到了1920年，图书的年出版量降到三千二百六十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年(1913)约为二万种——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政治或宣传性的。纸张与印刷设备奇缺，所有通讯手段日趋恶化，这使得甚至是苏维埃机构出版的日报与周刊的规模和发行量也大为缩减。

政府颁布实行新历法和新缀字法的法令（这两个法令在革命很久以前就已制订，并由当时学术机构通过）在知识分子看来，不过是全盘否定过去的征象而已。由于社会不安全和秩序混乱而引起的物质困难和恐惧心理，使得任何不断的创造性努力都是徒劳的。1918—1922年的内战使俄国三分之二的田园荒芜，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大批人加入红军或白军，从而削弱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团体的队伍。军队即是无声的法律，法律上认为正确的，文艺女神也同样认为正确的；文学似乎成了多余的东西。作家们迷离恍惚，意志消沉，完全不能应付局势。他们把自己比之于被旋风所刮起的沙砾。他们的整个意识形态都淹没在整个大剧变的漩涡里。曾经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感到激奋或震惊的问题大都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化为灰烬。传统的主题和人物象着了魔般消失得一千二净。不久前各种文学流派的争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老读者和人们熟悉的评论家也都销声匿迹了。一切文化和艺术的各种关系都摇摇欲坠，所有的权威人士都黯然失色，俄国文苑中的所有雕像都被砸得粉碎。一切必须重新建立——就在这场大火的现场上建立起来。在知识界和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震惊、沮丧或完全忙于每日搜寻食品、燃料和衣着时，那些积极参加这些事件或同情革命的人则在这场风暴的狂乱中获得振奋。革命就是力量的大

解放，开始时粗野又具有破坏性；猛暴的群众运动使它具有势不可当、残忍而英勇的特征，在废墟、危险、原始的激情以及死亡中，生活是奇异和令人兴奋的。这是一个动人哀感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这些重要的年代里写下的任何作品——不管它的艺术价值如何——都多多少少反映了这场“大爆发”。

文学活动的复兴是缓慢和循序渐进的。它受到三种主要因素的促进。革命前的各个团体或个人在克服了震惊和冷漠的情绪后，试图改变自己的方向：或者是继续他们所代表的思潮，或者是使这种思潮适应于新的情况。但是，年轻人（他们大多参加了战斗）都有强烈的欲望，要有所创造地反映他们的时代，表达他们的亲身经历——有时是以一种很粗糙的方式——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主体，在俄国文学史上开创了新的篇章。在二十年代，新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老一辈。最后，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大多是旧知识分子）急欲促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改变了的社会秩序的文学。他们自己的理论还要求他们采取大规模的群众教育的措施——这就包括了文学，戏剧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这三种因素在最初年代里的独立发展和相互影响决定了苏联文学界的整个结构。各文学团体间的关系从激烈斗争转入相互合作，共产党对文学生活的干预变得日益强烈和重要，社会的低等阶层取代了旧的统治阶级，结果就产生了新的读者和观众。随着政权的巩固，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变得更加明显（不过群众对所有艺术的真正压力，以及党的控制的系统化则是二十年代后期的事）。

凡是要了解苏联文学的起源和演变的人，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在那些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化的中产阶层中间有一种世界末日已经到来的感觉；但是，革命前的各种文学思潮还是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它们确实幸存下来，并常常同新的思潮并存，而

且影响后者。在极其复杂的苏联文坛上，许多看上去自相矛盾的现象都可以由这种幸存的文学思潮解释清楚。斯大林时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曾经试图否定这种情况，或者干脆无视这些事实，于是在苏联的历史性和评论性的各种文论中出现了一幅极受歪曲的二十年代画面。但是，事实证明，文学的传统比旧政权其它许多的“残余的东西”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二十世纪初期的各种各样的文学运动，例如象征主义或意象主义，简直是大摇大摆地跨过革命后的年代，随后才逐渐在苏维埃的统治下筋疲力尽。一些流派灭绝了，其余的则混合在新的文学中。还有一些如未来主义或托尔斯泰式的心理现实主义对苏联作家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不少事例中（如革拉特珂夫的情况），作为新的和富有独创性而出版的，并且有“苏联制造”标记的小说作品，实际上不过是旧作品的翻版或改写本而已。客观地说，俄国文学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尽管1918—1920年间的青年作家们感到他们象拓荒者那样，在荒野里挥斧伐木，建筑新居，实际上，他们是用革命前的先辈们遗留下的砖瓦垒墙和盖顶。

按年代来说，第一批曾试图“歌颂革命”的作家是“西叙亚”派，他们大多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的理论家拉祖姆尼克·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1879—1946年）以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1906年）赢得评论家和作家的声誉。他在1917—1922年中，对勃洛克、叶赛宁、克留耶夫以及其他一些诗人和小说家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因为他当时是“西叙亚”派的缔造者和理论大师。该派以民粹主义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倾向为特征。他后来经常受到迫害和监禁。他在《监禁和流放》一书中，描写了个人经历和斯大林时期俄国作家的悲惨境遇。这本感人的书是四十年代在国外发表的。从政治上说，“西叙亚”派接近于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文学上，他们支持象征派和现代派。他们把大动乱解释为群众（主要是农民）的一

场暴动。这些人渴望实行社会正义，把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变成了一场标有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社会主义运动。“西叙亚”派的作品，形式上是抒情的，内容则是乌托邦式的，反映出苏联文学的萌芽状态。这种文学似乎是直接从宗教和社会的象征主义那里派生出来的。1918年初，在勃洛克发表《十二个》时，他的诗引起了没完没了的争论。因为诗中不仅把十二个在大雪封困的彼得堡行凶抢劫的红军战士描绘成土匪，而且还把他们描绘为仇恨旧世界，朦胧向往美好生活的梦想者。耶稣作为那些人的无形的领袖出现在诗的末尾。这样，这十二个罪犯成了十二个门徒。在鲜血和污秽中出现了新福音的形象，为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和浩劫开脱罪责。这首诗听上去象是旧俄国的一首挽歌——也象是宣称耶稣复活的复活节弥撒。死亡和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交织在诗中。诗的形式把现实主义的描写和象征主义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反共分子把它看成是对神明的亵渎，而共产党人对把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灵看成为具有最深刻革命真理的人这一点并不十分高兴。他们对勃洛克的“西叙亚”派也不很满意。这是一首重新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世界主义观念的颂歌，但诗人强调这个民族粗犷的原始力量，并威胁西方：如果欧洲拒绝同这个革命的国家合作，斯拉夫人和亚洲人将联合在一起。这些诗歌所激起的反响如此强烈，以致即使在今天，它们在苏联读者和俄国流亡者中间还引起了颇有偏见和争执激烈的评价。

对布尔什维克革命首先作出积极反应的竟然是来自体现整个时代的贵族文化的象征派，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象征派对这场大变动已有预感。他们完全有能力表达自己的信念：莫斯科点燃的火焰将烧遍整个世界，“把所有的资产阶级化为灰烬”，正如勃洛克在《十二个》中写的那样。革命的救世主义到处流传。在城市和乡村，演说者们都称俄国为人类的救星和新社会的缔造者。诗

人们表达了同样的信念——也是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旧信念。安德烈·别雷在他的《基督复活》(1918)一书中诉说了拯救人类所付出的痛苦和牺牲。不少次要的诗人都遵循这股宗教思潮。其余的人则强调民众运动的民族特征。马克西米林·沃洛欣(1877—1932年),一个曾经描写过巴黎和地中海的象征主义者,这会儿正在起劲地鼓吹神秘的爱国主义。他那些关于斯杰潘·拉辛(伏尔加河的反叛海盗)以及其他历史性人物的诗歌,把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的大爆乱写成深刻的民族主义的东西,并探究当代事件的历史根源。同时,他却被红色恐怖及其盲目的破坏性吓得魂飞魄散。他以这个主题所写的最动人的一些诗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禁止在俄国出版(他显然是在1925年左右停止写作的)。但是,尽管他有反共的观点,他却认为,“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并问道,“那么,为什么这种深深打动人的信仰还要泛滥,把我也卷入在内呢?”其他一些象征派或阿克美派如安娜·阿赫玛托娃也歌颂光明,以救世主的狂热叙说革命。

但是,那些年轻的,为苏维埃的胜利实际战斗过的人,却同神秘的或宗教性的思潮毫不相干。他们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诗歌强调宏伟、席卷世界的事件,并且是赤裸裸的乌托邦和夸张式的。一批无产阶级诗人把自己称为宇宙主义者,预言要征服我们星球之外的空间:“我们要先征服地球,随后发起星星上的暴动……起义的臂膀搅乱太空,工人的统治要跨进另一个世界。”

1918—1920年的青年诗人,大多被希望搅得眼花缭乱,同时又把他们称为社会与政治的地震搞得惊恐万状。他们期待随时随地出现世界革命。他们听到了历史的脚步声。俄国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欢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土崩瓦解,这些都象吹响了世界起义的进军号角。但是,反映这种情绪的救世主式的诗歌只不过是感情的迸发,大多没有多大的

文学价值。它们通常是在大厅、俱乐部、酒馆里高声朗读的。由于缺乏纸张，油墨和印刷设备，迫使诗人直接向读者朗诵。这就是苏联文学的“咖啡馆时期”。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所有地下室（如“毕加斯马槽”或“诗人咖啡馆”）都被用来作讲台，特别是为意象派和未来派所用。诗歌是最合适的形式，它不象散文作品那样需要长时期的准备，可以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作出自发而充满感情的反应。这就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诗人们——特别是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最受欢迎的人物，以及为什么诗歌作品会风行于苏联文学的第一阶段。

## 第二章

### 谢尔盖·叶赛宁

#### 恍惚迷离的农民

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年)是梁赞一个农民的儿子，当过羊倌，当他1915年出现在圣彼得堡的文学沙龙时，人们称之为真正的“人民诗人”。这位身穿农民短衫，腰系鲜艳丝带的年轻人朗诵着(更确切地说是吟哦着)描绘丰收、牛群、云彩和草原的诗。他用民间抒情诗来歌唱可爱的耶稣和俄罗斯中部那令人伤感的景色。他笔下具有特殊风格的圣徒们对着坐在金色云端的圣父，向他的圣子——带领朝圣者越过田野的救世主作祷告，而圣母玛丽亚则把农妇的花头巾遮在自己的金发辮上。叶赛宁以牧羊人天真烂漫的眼光所看到的大自然、小茅屋和宁静的村庄，与城市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那种柔和色彩——蓝、金、桃红——透着弗拉·安吉利科<sup>①</sup>的韵味。

1913—1917年期间叶赛宁从象征派那里学到高超的诗歌技巧，又在这技巧中加上他的固有的特性。他的最初出版的作品博得评论家们好评。甚至皇后也饶有兴味地听他朗诵过诗，并询问诗人为何写得如此悲伤(这是叶赛宁在革命后不愿提及的事)。1917年，叶赛宁同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有了密切的联系。他的第一个妻子雷奇·齐娜伊达(她跟他离婚后又同符谢沃洛德·梅叶尔霍尔德

---

<sup>①</sup> 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僧侣画家。

结婚)曾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在伊凡诺夫—拉佐姆尼克和其他一些“西叙亚”派的影响下,叶赛宁加入社会革命党持不同意见的左翼。该党起初曾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后来又同他们对抗,成为反对派。“我那时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个最激烈的同路人,”他在自传中这样说,“但是,我用我自己的见解来解释它,使它带有农民的倾向。”他的思想是民粹派式的革命救世思想。他的著名的长诗《伊诺尼亚》,描绘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农业共和国中的乡村天堂,在那里,生活同“大自然母亲”完全和谐一致。在这个“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国家里,从没有出现过城市。在叶赛宁看来,城镇仍然是奴役人的机械化文明的象征。诗人警告美国不要“在亵渎神灵的海上行船”,并预言摩天大楼和工业巨人必然崩溃。假如他能活得更久一些,那些五年计划和苏联的城市化准会教他吓破了胆。在叶赛宁看来,革命就等于是回到原始的民主社会和农民的村社。他在圣歌般的诗里颂扬农民生活:耶稣复活、复活节、耶稣降临、耶稣变形——这些就是他在1918年使用的隐喻。

在《同志》一诗里,耶稣降到人间,帮助俄罗斯人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警察的子弹把耶稣打死了。人们将他和其他反抗沙皇的受害者们一起葬在公墓中,而“共和国这个钢铁般的词语回荡在大街小巷”。然而,在这种诗的精神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矛盾。俄罗斯当时到处响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艺术的演说,叶赛宁则用他乡土味的柳琴赞颂十月革命,从圣歌、符咒、民歌及其他民间素材中找明喻和词汇来丰富象征主义的诗歌。虽然机关枪格格地响,内战激烈进行,宁静而虔诚的抒情美梦完全不适时宜,他却仍然吟唱耕耘、晒干草、仁慈的圣徒和神秘的流浪汉。由于新闻检查官不许他使用“宗教术语”,他当时发表诗歌极为艰难。他的朋友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遭到共产党的残酷迫害。因为事实上革命不是田园诗的

理想化，城市在对农村发动战争，并派出讨伐队，深入村庄强征农民为躲避新主人而储藏的粮食。列宁所想望的是大小工厂的电气化，共产党人急于要摧毁到处是简陋的农舍和听天由命的农民这个圣洁的俄罗斯。

叶赛宁起初试图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使自己的生活和诗歌适应现实。他任凭他的好斗性、狂欢性和粗鲁性纵情奔放，而这些在他那爱梦想和淳朴的性格中一直处于蛰伏状态。他尽力消除自己身上那种教堂唱诗班男孩的痕迹，写十八世纪的反叛者和冒名僭位者普加乔夫，写中世纪歌曲中的冒险英雄瓦斯卡·布斯拉耶夫，以及动乱的城市诺夫哥罗德的妇女领袖玛莎等人的诗。他总是喜爱塑造富有色彩的带点儿古怪的形象，这些都是来自民谣并使人想起那些有名的木刻：“月亮——那只壮健的鹅”，“浮云好似池塘”，“黎明象只母狼”。1918—1919年，当十几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如虚无派、宇宙派、超现实派以及其他许多派别在为寻求新的诗歌形式而相互竞争时，叶赛宁即刻成为意象派的领袖。这里必须强调指出，俄罗斯意象派同埃兹拉·庞德<sup>①</sup>所创建并由艾米·洛威尔<sup>②</sup>在1914年发展的意象派毫无关系。它得到下列一些嘈嘈闹闹的次要诗人的支持：阿纳托利·马林霍夫（生于1897年）、路里克·伊夫涅夫（米哈伊尔·科瓦列夫，生于1893年）、瓦季姆·谢尔申涅维奇（生于1893年）和亚历山大·库西科夫（生于1896年）。这个派别宣称形象高于所有其他诗歌创作要素，包括意识和韵律在内。“一串断了线的形象”就是诗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每个形象必须令人惊讶，引人注目和栩栩如生，能对读者产生影响。

就风格说来，意象派是象征主义的派生物，它的实际目的是要创造一种通过一连串奇特的明喻而诉诸潜意识的诗歌。对叶赛

---

① 埃兹拉·庞德(1885—1973)，美国诗人。

② 艾米·洛威尔(1874—1925)，美国女诗人和文学批评家。